

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知识大众化的特点及发展趋向

王记录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新乡 453007)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知识大众化的特点和发展趋向表现在五个方面:从传媒变化看,出现了由单一印刷媒体向影视、网络等多媒体发展的趋向,从而改变了历史知识传播和文本构建的模式,并影响到民众对历史的认知;在书写者方面,出现了职业史家书写向公众书写发展的趋向,公众逐步成为历史知识大众化的主体;在目的性方面,出现从教育人向娱乐人转化的趋向,娱乐休闲逐步消解和取代了爱国主义等高尚意义的诉求;在学科建设上,从学科附庸向学科独立发展,中国本土的通俗史学与西方的公众史学相遇,加快了学科建设的探索;在作品评价上,从学界内部向全民参与发展,历史知识大众化的成果不断变成“公共话题”,出现全民热议的情况。

关键词:改革开放;历史知识大众化;公众史学;传媒

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15)04-0023-09

DOI:10.16197/j.cnki.lnupse.2015.04.004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政治环境的宽松、社会的宽容、技术的进步和大众文化的勃兴,历史知识大众化也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迅速发展,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出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趋向。下面从传媒变化、书写者、目的性、学科建设、作品评价五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传播媒介:从单一媒体向多媒体发展

媒体是历史信息传播的载体。从历史上看,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传播技术的发展,从无文字时期历史知识的口头传播,到以龟甲、兽骨、简牍、丝帛为载体的历史文献,再到纸质的书籍、报刊,人们获取历史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广播、电视、电影、网络走入千家万户,历史知识传播的渠道进一步拓宽,人们获取历史知识更为便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众媒体的发展非常迅速,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1980年代,印刷媒体享有绝对的霸主地位,1990年代以来,电子媒介、数字媒介渐占上风”^[1]。进入21世纪,以电视、网络为代表的电子媒体则迅速普及。据国家信息中心《中国数字鸿沟报告》课题组的调研,2004年,中国网民总人数只有9400万,互联网普及率为7.23%,截至2012年底,我国网民规模已达到5.6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2.1%;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截至2012年底,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已达到4.2亿;而全国家庭彩电保有量到2012年底已达到5.59亿台^[2]。传播技术的改进和传播水平的提升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使历史书写和记载的平台更为多元化,使历史的传播渠道更为多样化。根据中国媒体发展的事实,我们可以这样概括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知识大众化传播形式的变迁:20世纪80年代主要依靠书籍、报刊等印刷媒体传播,那个时代的人们主要靠读书阅报等形式获得历史知识;进入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书籍、报刊等

收稿日期:2015-04-16

作者简介:王记录,男,河南范县人,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和清代学术史。

印刷媒体与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电子媒体共同传播的局面;及至21世纪,电视、电影、网络等电子媒体超越印刷媒体,在历史知识的传播方面取得了优势地位。

传媒不仅仅传播历史知识,它还参与历史文本的建构。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知识大众化的文本生成和传播方式,很容易看出其从单一媒体向多媒体发展的事实。20世纪80年代直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史学界在讨论历史知识大众化问题时大多只注意历史通俗读物的撰写,还很少有人关注电子媒体在传播历史知识中的作用。比如20世纪80年代,白寿彝先生就撰写多篇文章,号召专家撰写通俗历史读物,把历史知识交给民众,强调通俗历史读物是通俗不是粗俗,撰写者需要具备很高的学术修养等问题〔3〕。臧嵘提出历史普及是摆脱“史学危机”、发挥史学功能的必由之路,其普及途径有历史教学、历史普及读物以及历史小说、戏剧等形式〔4〕。20世纪90年代,黄留珠坚持主张史学社会价值实现的途径就是通俗化,通俗史学的表现形式需要拓宽,通俗史学的应用领域需要扩大〔5〕。张晓校曾严厉批评了当时通俗史学庸俗、媚俗和恶俗的问题,指出不少通俗史学作品缺少科学性和严肃性,变成了庸俗史学〔6〕。其所指的对象依然多是印刷媒体所形成的通俗史学文本。当时的学者之所以重视通俗历史读物的撰写,是因为其他的传播方式尚未占据主流,充斥整个历史知识大众化市场的主要还是印刷文本。

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印刷文本、影像文本、网络文本等各种文本的历史作品蜂拥而出,电视讲述历史、影视再现历史、网络写作历史纷纷出笼,热闹非凡,人们对历史知识大众化的表达方式和认知也随着传播媒体的多样化而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传播层面。随着电子技术的飞跃发展和媒体的发达,大大丰富了人们表现历史的手法,同时也使历史书写更为及时和快速。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采用摄像、摄影、录音等手段来表达,从而转变成人们乐于接受的精神文化产品。传媒的进步对历史知识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比如,互联网数字技术具有多媒体性和互动性,它不仅可以通过声音、影像更为直观地再现历史,丰富历史的呈现形态,而且拓展了互动传播的平台,使公众对历史的接触与参与渠道更加便捷。公众可以随时通过网络对之做出回应,表达自己对历史的看法,这种传播的及时互动性是印刷媒体所无法相比的。

其二,文本构建层面。电子传媒不仅是历史书写的重要工具,而且改变了传统历史书写的方式及手段〔7〕。传统通俗历史读物的书写大多借助文字进行,即使辅以插图,也只是作为文字的补充,这就形成了历史书写的线性和一定的抽象性。相对于传统的历史文本书写,电子传媒则大大丰富了图文结合、声文结合的记载方式,完成了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形象为中心的转换,化抽象为具象,在文本构建上一改以往历史的静态书写,变为动态呈现,更为形象和直观。“使只有少数人理解的文字意义变成了大众可以通过视觉直接领会的影像意义”〔8〕。再者,电子传媒能够摆脱旧有的精英历史模式,通过民间眼光观察历史,小视觉大视野〔9〕。现代社会,传媒渗入生活的各个层面,也使原来各种各样被历史宏大叙事所忽视的历史细节有了充分的传播平台。可以这样说,各种媒介形态为各类不同题材的历史内容提供了合适的传播形式,由此也促进了书写史学的重新定位〔10〕。

其三,认知层面。随着现代传播工具的普及,史学大众化的书写改变了以往历史文本书写的精英性、严肃性和权威性,已经日常化和生活化。不同的媒体偏好某些特殊的历史内容,每一种媒体都为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现代传媒的娱乐性、视觉性、短暂性和商品性等特点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将许多精英书写遮蔽的东西释放,呈现为大众化、狂欢化和影像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历史的严谨性和庄重感,甚至颠覆人们对历史的既有看法,使历史精神的传播出现偏差,进而影响受众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观。也正是因为这样,新世纪以来,人们对各种诸多媒体上的“正说”“戏说”“臆说”历史的现象表现出愤怒。

二、书写者:从职业史家书写向公众书写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知识大众化的另外一个发展趋势就是书写者的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历史知识大众化主要由职业史家来完成,这里所谓的职业史家,主要是指高等院校、中学、科研院所的历史教师、历史研究者,他们以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为职业,掌握比较丰富的历史知识,故而成为历史知识大众化的书写者和传播者。但是,进入21世纪,职业史家垄断大众史学作品书写的局面被打破,众多非历史专业的作者进入大众史学作品的书写领域,而且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作者中有自由撰稿人、公务员、文学艺术工作者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甚至自然科学工作者,他们并不以历史教学或历史研究为终身职业,但他们对传播历史知识有着浓厚的兴趣,形成了历史知识大众化书写和传播的新景观。

以职业史家的专业特长来做历史知识普及性的工作,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形成了传统。50年代末60年代初,吴晗主持编写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就号召从事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应该把提高的成果用通俗可读的文字普及给广大人民群众,使这些东西为人民群众知识的组成部分”。同时要求“每人就自己的专门论文、专门著作进一步提炼一下,使它通俗化,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11〕。从中外两套“历史小丛书”的编委会和编写者来看,基本上都是职业的历史教师或研究人员,一部分还是著名学者,如吴晗、宁可、万绳楠、侯仁之、任继愈、周一良、何兹全、戴逸、邱汉生、贾兰坡、张晋藩、罗哲文、单士元、万国鼎、魏瀛涛、周谷城、齐思和、吴于廑、罗荣渠等等。职业史家参与历史知识的大众化工作,可以保证学术质量,更容易让普通民众信任和喜爱。

吴晗号召历史专家撰写通俗读物的思想被白寿彝所继承,改革开放之初,白寿彝先生就说:“在史学工作者队伍里,应该有思想家、著作家、评论家、文献学家,还应该善于写通俗读物的专家……如何写出新的历史读物,把正确的历史知识交给广大人民群众,这是一项艰巨的史学工作。”〔12〕白先生的言论发表于1984年,说明当时人们是把历史知识大众化创作的视野局限在职业史家范围内的,希望职业史家能够走出象牙塔,多写作一些通俗历史读物,把历史知识普及到人民群众中。在印刷媒体占据传媒主流的改革开放初期,职业史家确实垄断了通俗历史读物的书写。1981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常识》六个分册,作者有百人以上;“大部分是大学的历史教师和历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也有一些比较知名的史学专家”〔13〕。1984年,中国史学会和中国出版者协会举办了全国首次爱国主义优秀通俗历史读物的评选活动,从近2000种出版物中评出了28种优秀作品,无一不是职业历史学家所撰写。“从获奖作品的作者看,既有老一辈的史学家,也有学有专长的中年学者,还有一些近年才崭露头角的青年史学工作者”〔14〕。

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和传媒技术的进步,文化领域也出现了走向市场化的趋势,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化的大众化和共享化,消解了传统的文化边界和文化规则,使人人都有可能参与、享受、消费文化”〔15〕。而历史知识大众化恰恰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在市场经济发展和传媒技术进步的双重作用下,历史书写不仅变得更加自由,而且成为人人都有可能参与、享受和消费的文化。于是职业史家垄断书写和传播大众化历史知识的局面被打破,公众不甘于只是作为被动的阅读者和视听者,而逐步进入历史知识大众化领域,积极投身历史探索和书写中,不少人成功地在该领域确立了自己的影响和地位,独擅胜场。

试看新世纪以来历史知识大众化的火热场景:历史题材影视剧热播,历史通俗读物热销,电视讲史受到热捧,小历史书写渐兴,民间口述历史渐热,历史名人得到热抢,虚假古迹得以热建。如此等等,在这种大众文化背景下的历史文化消费的狂欢中,又有多少专业史家的身影?

很显然,新世纪以来,公众参与历史书写的程度越来越深,热情越来越高。以网络通俗历史写作为

例,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写手涌现,作品多到无法统计,粉丝读者更是数不胜数,真正出现了写手多、作品多、读者多的“三多”现象,而这些热衷于历史写作的写作者,很少是历史专业出身,多数没有经过系统的学术规范的训练〔16〕。再如历史题材影像作品的创作,更少有专业史家介入。除了历史纪录片还比较注意聘请历史学家做顾问以外,其他形式的历史题材影视节目则很少听取历史学家的意见,几乎完全由业余史学爱好者与影视人共同创作录制而成。难怪有学者认为大众历史热的一大特点是“作者业余化”〔17〕。

新世纪以来,公众写史成为一个潮流,大量充斥网络和报刊的有关“平民写史”和“草根写史”的讨论,也印证了这一事实:写史者非专业史家,而是“平民”和“草根”。2007年创刊的《国家历史》杂志,发刊词的题目就是“我们一起来书写历史”,认为“这是一个‘公民写史’的时代,它给了我们每个人一支笔,以打破几千年来被官史和史官垄断的历史书写权和解释权”。近几年来,平民史写作更是成为史学大众化过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批记录“小民往事”的平民史著作问世,诸如《蹉跎坡旧事》《穷时候,乱时候》《活路》《雨打芭蕉》《平如美棠》《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从小李到老李》等,这些书的作者大多是“世纪老人”,他们都是普通民众,完全体现了“人人书写历史,并且书写大众的历史”这一观念〔18〕。

从改革开放之初职业史家垄断历史通俗读物的书写到新世纪以来公众书写历史的独擅胜场,致使职业史家“缺位”〔19〕,其间的转变发人深思。这—是因为社会的进步使民众有了主动参与历史创造活动的激情、叙述历史发展过程的冲动和表达历史思想的可能;二是因为媒体的发达使越来越多的民众有了能够发表自己历史看法的条件。恰如何怀宏所言:“社会的进步赋予了公民写史的可能。而记录和传播技术的演进则给了每个人书写历史的手段”〔20〕。自此以后,专业史学家对历史知识生产的绝对支配权和话语权将会不复存在。

三、目的性:从教育人向娱乐人转变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历史知识大众化都有着明确的目的,那就是教育人。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的内容会有所变化,但通过历史知识大众化自上而下地向民众灌输某种思想观念,却是一个共同现象。

在新中国历史上,吴晗主持编撰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影响巨大,代表了当时历史知识普及的普遍价值取向。该套小丛书“从策划到编写,从编辑到出版,始终将传播正确的历史知识、普及历史教育作为出发点,将宣传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发挥历史学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作为目的”〔21〕。很显然,吴晗等人就是要通过通俗历史读物的编写对人们进行唯物史观和爱国主义教育。

改革开放初期,历史知识大众化依然被赋予神圣的使命,肩负着教育人的重任。当时一大批著名史家都谈到历史知识大众化的使命感问题,白寿彝先生认为,普及历史知识“是一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史学工作者的任务,是要对历史遗产的优秀部分进行整理,经过加工,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宣传……如爱国主义的思想,民族团结的思想,勤劳、勇敢、不怕牺牲的精神……对历史遗产中的糟粕部分,史学工作者则有责任加以剔除,廓清其消极影响……唯其如此,撰写通俗读物,把正确的历史知识交给广大人民群众,是史学工作者的艰苦而重要的任务”〔22〕。彭明认为,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用历史的经验去教育青年,这种力量是不可低估的”〔23〕。苏双碧向人们推荐《中国历史故事》一书,特别指出该通俗读物“比较突出近代史上各族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先进思想家积极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历史,对向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会起到积极的作用”〔24〕。编辑家郑一奇更是把通俗历史读物的教化作用提高到政治层面进行认识:“要振作起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并把这种热情建立在对祖国的深刻了解上,就迫切需要出版一大批爱国主义通俗历史读物,这不能不说是一项非常迫切的政治任务”〔25〕。1984

年,为了编写出版更多更好的通俗历史读物,中国史学会组织了首次爱国主义优秀通俗历史读物的评选,其标准就是“作品应具有较高的思想性、科学性、生动性。通过对历史事实准确、生动的记述,能够起到帮读者了解祖国历史,激发爱国热情的作用”,并且指出“运用历史题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大有可为的”〔26〕。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初期,历史知识大众化承载着弘扬优秀文化遗产、培育人们爱国热情的重要职责,普及历史知识的目的无外乎是让人们通过学习历史,提高素质,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增强对祖国的热爱,对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等,所有这些都是把教育人作为出发点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众文化的发展,这种在普及历史知识过程中教育人的预设悄然发生变化,人们不再高悬道德或正义的利剑,公众史学作品考虑最多的不再是如何通过历史知识大众化来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而是如何使人们获得娱乐和放松。笔者曾检索新世纪以来有关历史知识大众化的大量文章,发现相关讨论之热烈前所未有,但无论持何种观点,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绝大多数人在谈论这一问题时隐去了高尚意义的诉求,消解了爱国价值的文化内涵,而变成对“时尚”“有趣”“娱乐”“休闲”的追求。

历史知识大众化的这种既“时尚”又“娱乐”、“能休闲”且“有趣”的价值追求,充斥着新世纪以来的网络、影视和出版物。人们甚至用“娱乐史学”“时尚史学”“八卦史学”等概念来称呼和概括它们。有学者指出:“史学的社会化需要娱乐化……就一般民众的历史文化水平和接受特点而言,娱乐化是他们最喜欢、最能够接受的传播方式……他们接受史学社会化的主要目的在于娱乐,虽然这种接受也有学习知识的功能。既然客体有娱乐的需求又有选择的权利,那么史学社会化只有尊重这种需求和权利,采取娱乐化的方式,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27〕。在这样的需求下,历史知识大众化的目的“一是娱乐,二可激发青少年对历史的兴趣(纯粹胡说的除外),三多多少少普及些历史知识”〔28〕。娱乐被排在第一位。

通过传播历史知识“娱乐”公众,主要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表现:

就积极方面而言,这些作品或通过描写,或通过讲述,或通过影视表现,或通过景观展示,均采用了艺术化的演绎和表达。人物刻画栩栩如生,内容描写细致入微,故事铺陈层层推进,场景展示生动直观。这些作品从微观出发,注重生动逼真的历史细节的刻画,打捞历史的碎片,关注权术争斗、人事纠葛、命运沉浮乃至逸事趣闻、爱恨情仇等,赋予历史以丰满的血肉和艳丽的姿色。它们还从普通人的角度对历史进行考量,设身处地对历史人物报以同情、感慨、崇敬、惋惜等人类应有的感情,勾起民众对现实生活的感悟,从而引起共鸣。它们不站在高处发话,也不进行说教,使人感到亲切平和。这些作品还以历史人物的处境为背景,进行合理的心理分析,剖析他们的所思所想,引导现代人心灵回归〔29〕。所有这些,自然就使民众沉浸于大众化史学的“精彩好看”的场景里不能自拔。

就消极方面而言,这些作品存在着内容庸俗、史实讹舛、史观错误等诸多问题。为了追逐经济利益,吸引人们的眼球,一味媚俗,不少作品把目光盯在历史糟粕上,什么“皇宫秘闻”“后妃私事”“历史人物的私生活”等,均被人拿来“戏说”。有些作品不尊重历史,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的幌子任意编造、杜撰和调侃历史,故意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任意褒贬人物,颠覆历史,混淆善恶是非。这种“歪说”“恶搞”“八卦”的历史,很热闹,很“有趣”,也很“娱乐”,但却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消解了历史的精神。难怪有人惊呼“大众史学已经被游戏化”!这些作品“将历史审美化、传奇化、娱乐化、八卦化,缺乏冷静的思考、睿智的见识以及对史实应有的尊重”〔30〕。“历史俨然成了一个娱乐圈,里面充斥着各种桃色事件、各种比明星隐私还要香艳刺激的名人丑闻事件”,活脱脱一幅“八卦史学”的图景〔31〕。

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所著《娱乐至死》一书认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娱乐化的时代,电视和电脑正在代替印刷机,文化的严谨性、思想性和深刻性正让位于娱乐和简单快感。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以来历史

知识大众化从政治说教、道德训诫、人文理想的阐释向怡情悦性、休闲消遣甚至“戏说”“恶搞”的转变,所反映的既是人文价值的失落,也是后现代社会大众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当然,这种娱乐化倾向遭到了专家和民众的共同抵制,人们对历史知识大众化的真实性、科学性、严谨性充满了期待。

四、学科建设:从附庸向独立发展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知识大众化经历了一个由学科附庸向学科独立的发展过程,从最初的不具备任何学科特性的历史知识普及,到近几年公众史学学科框架的提出,历史知识大众化完成了华丽转身。在这一过程中,相关概念和内涵的变化,中西史学的碰撞,都对学科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所谓历史知识大众化基本上指的是人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撰写通俗历史读物,把历史知识普及给广大民众,使民众能够更多地了解中外历史。它依附于严肃的历史研究,是在“提高”基础上所进行的“普及”,并不存在作为一个学科的理论认知^[32]。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围绕历史知识大众化产生了诸多概念,如“通俗史学”“大众史学”“平民史学”“草根史学”“娱乐史学”“时尚史学”等,这些概念都产生于中国本土,但内涵各有侧重。“通俗史学”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它是相对于那些艰深晦涩、居庙堂之高的史学而言的,强调的是内容的通俗易懂,形式的生动活泼,总之以容易为民众接受为目的。“大众史学”是在“通俗史学”概念之下衍生出来的概念,其内涵与“通俗史学”十分接近。“平民史学”“草根史学”“娱乐史学”“时尚史学”等概念是随着新世纪以来“通俗历史热”而产生的。所谓“平民史学”“草根史学”是从作者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指“平民”或“草根”撰述、讲述或制作的历史作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影响等。“娱乐史学”“时尚史学”的提法则带有调侃的味道,是指这类史学作品变成了文化消费的“时尚”,具有娱乐大众的功能。

围绕历史知识大众化所产生的这些概念虽然较为混乱,但却蕴含着一种倾向,即随着历史知识大众化的发展,“通俗史学”意欲摆脱附庸,展示自身所特有的学科个性。

也就在一过程中,学者们的讨论又从两个方面推进了历史知识大众化学科建设的进度。其一,从学理上探讨历史知识大众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赋予其前所未有的价值和意义。如黄留珠《时代呼唤通俗史学》、齐世荣《要促进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张海鹏《普及历史知识首先要尊重历史事实》、乔治忠《论历史知识普及工作的基本原则》、汪高鑫《论历史知识社会化的基本原则》、代继华《大众史学的评价标准献芹》以及钱茂伟的专著《史学通论》等,论述了历史知识大众化的目的、原则和方法,并基本达成共识。其二,从史学发展史的角度对通俗史学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梳理,进一步赋予通俗史学以学科史的地位。如彭卫《中国古代通俗史学初探》、李小树的专著《中华史学三千年史》及研究通俗史学的系列论文、钱茂伟的专著《明代史学的历程》、周朝民《中国近代通俗史学论》、王记录主编的《中国史学史》等,都把通俗史学纳入到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体系中进行论述,弥补了以往史学史学科体系不重视历史知识大众化的缺陷,为建立完善的史学史学科体系提供了学科史的支持。

但是,本土的理论探索虽然迈开了历史知识大众化向学科建设发展的步伐,但依然未能赋予其学科特性。真正实质性进行学科建设,是美国公众史学概念传入中国,中国本土的通俗史学与西方的公众史学碰撞和融合以后才产生的。

“公众史学”(public history)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20世纪80年代末被介绍到中国,有翻译成“大众史学”者^[33],也有翻译为“公共史学”者^[34],更多的人则认为“公众史学”更符合“public history”的本义。但在20世纪90年代,“公众史学”并没有引起史学界的重视,直到新世纪以来,学界对公众史学的关注度才越来越高,并开始了与中国本土通俗史学的碰撞和结合,而中国本土的通俗史学也逐渐被纳入到公众史学的话语体系中进行讨论,由此带动了历史知识大众化的学科建设。

在这方面,陈新、李娜、姜萌、钱茂伟做了很多工作。但归纳他们的论述,陈新、李娜更注重公众史学人才培养目标的设想,受美国公众史学体系影响较大。而姜萌、钱茂伟更重视将中国本土的历史知识大众化实践与西方的公众史学结合起来,反映出他们在构建公众史学学科体系时对中国本土的观照。陈新认为公众史学人才培养需要进行“社会道德与价值观分析与培育”“传统职业历史学方法论与实践性训练”“跨学科的知识储备”以及“公众历史知识生产的组织和实务操作”四个层次的训练^[35]。李娜则从课程设置方面进行探讨,认为公众史学人才培养可设置以下研究方向:城市历史保护;公众史学与大众传媒;公众史学与影视;文化遗产史学^[36]。陈新、李娜均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进行公众史学学科架构。姜萌综合中国本土的“通俗史学”和美国“公众史学”的实际情况,考察了这些概念的异同,认为公共史学应包括口述史学、影视史学、应用史学和历史通俗读物四个部分^[37]。钱茂伟在这方面作了更为深入的思考,他尤其重视中国本土通俗史学的传统,自觉把中国通俗史学与西方公众史学结合起来考虑,认为“公众史学的学科框架可以包括五个部分,即通俗史学、应用史学、小历史书写、公众写史、口述史学”^[38]。

迄今为止,虽然对公众史学学科建设的讨论远没有达成共识,但中国的历史知识大众化从本土自生到遭遇西方公众史学再到中西结合,从学科附庸到试图独立,其间的发展引人深思。笔者认为,中国史学发展有不同于西方的实际情况,中国史学服务于社会也有不同于西方的形式。当下中国,已经有了面向公众的多重史学实践,诸如丰富多彩的通俗历史读物的书写、电视讲史、口述史学、小历史书写以及在旅游规划、博物馆建设、历史街区建设、文化产业发展等领域都有着史学的身影。在进行理论总结和学科建设的时候,必须立足本土实际,借鉴西方,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五、作品评价:从学界内部向全民参与发展

在历史研究领域,一部学术著作的出版或一个学术观点的提出,即便是引起关注,也只局限在学术界内部,不可能进行更大范围的扩散。改革开放初期历史知识大众化作品的命运也大致是这样。当时不少作品发行量很大,如中国青年出版社印行的通俗历史读物已有5种发行百万册以上,最多的如《中国共产党历史讲话》发行288.1万册^[39]。1984年评选优秀爱国主义通俗历史读物,“获奖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在短时间里一版再版,有些书印数达几十万册之多。如《中国古代史常识》(历史地理部分)印了二十七万册《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第二集)印了四十二万册《中国近代史常识》已发行了五十九万册。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些作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40]。尽管按照今天的标准,这些作品都属于畅销书,都可以上畅销书排行榜,但是,由于受当时传媒技术和传播手段的限制,这些作品只是在史学界、编辑界引起关注,有一些著名史学家、编辑家撰写书评向民众推介,而民众更多的是被动接受这些观点,没有更多表达自己看法的渠道,因此不会产生全民参与作品评价的现象。

但是,这种情况在新世纪以来的历史知识大众化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很多作品的产生都引起全民关注,产生“蝴蝶效应”,成了“公共话题”,出现了诸多文化“现象”。我们就以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和《百家讲坛》易中天讲史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当年明月不过是一个年轻的海关公务员,因为爱好历史,自2006年起在博客上连载长篇通俗历史作品《明朝那些事儿》,三个月时间点击量就超过百万,被出版社看中,遂于2006年底出版。随后,当年明月乘胜追击,出版了七卷本的《明朝那些事儿》,引起轰动,受到全民关注和评论。

《明朝那些事儿》自2006—2008年就一直高居畅销书排行榜前列,多次获得“新浪图书风云榜”最佳图书、“卓越亚马逊图书大奖”、当当网“终身五星级最佳图书”,并被翻译成日、韩、英等多国文字出版发行,销量超过千万册,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畅销的历史读本之一,影响巨大。当年明月利用网络写作的方式,吸引了大批粉丝聚集在自己周围,访问量超过2.2亿,借助网络点击率制造了匪夷所思的阅读神

话。网友不仅阅读《明朝那些事儿》,还随时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赞同,或反对,网友与当年明月、网友与网友之间就历史问题进行互动。当年明月还从幕后走向前台,接收电视、报刊的采访,影响更为扩大,产生了连锁效应。《汉朝那些事儿》《唐朝那些事儿》等模仿之作纷纷出笼。打开电脑利用百度搜索《明朝那些事儿》,竟然得到100多万个结果,百度建立了“明朝那些事儿吧”,帖子达70多万条,并持续更新。围绕《明朝那些事儿》产生了激烈争论,褒贬不一,成了全民的文化娱乐。

和当年明月不同,易中天一开始就占据了传媒的要津,依靠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品三国”为全民所知,出现了“易中天现象”。“一时间社会上人人争说易中天”^[41],易中天的微博粉丝达340多万,易中天在《百家讲坛》所讲内容汇成《易中天品三国》一书出版;自2006年7月上市以来,一直雄霸国内各大综合图书排行榜首席,上市半年就已经销售130多万册^[42]。易中天被戏称为“学术明星”“学术超男”,不断在各类电视节目上露脸,甚至成为文化类节目的主持人,风光无限。围绕易中天讲史所引起的争议也纷纷出现在网络报刊上,上至专家学者、下至普通民众,都通过各种方式发声,有叫好者,有拍砖者;“易中天现象”成了全民热议的话题。赞扬者认为易中天在象牙塔和民众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在大众传媒上开辟了一条学术与市井结合的新路,推动了历史文化的普及,丰富了大众的精神生活;批判者认为易中天降低了历史文化的品格,快餐式讲史把历史文化低俗化了,调侃媚俗,消解了人们对历史的“敬畏感”。

不管是针对《明朝那些事儿》还是针对“易中天现象”,公众在讨论问题时往往涉及历史知识大众化的方方面面,诸如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学术性与娱乐化、文学与历史、高雅与通俗、深刻与浅薄等诸多问题,都被拿来议论。公众如此大规模地参与历史知识大众化产品的评价,在改革开放初期几乎是不可能的。当下之所以能做到这些,主要原因我们在前面也讨论过,即社会的进步和媒体的发达,社会进步使人可以较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媒体发达,尤其是“网络时代”为公众参与文化建设提供了平等发声的平台。没有这两点,就不可能有全民讨论历史文化现象的情况出现。

参考文献

- [1] 赵勇. 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8.
- [2] 张新红. 中国数字鸿沟报告2013[EB/OL]. 国家信息中心.http://www.sic.gov.cn/News/287/2782.htm#_ftn1
- [3] 12[22] 白寿彝. 白寿彝史学论集(上)[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289.
- [4] 臧嵘. 历史教育与历史普及[J]. 课程·教材·教法,1988(9).
- [5] 黄留珠. 时代呼唤通俗史学[J]. 学习与探索,1993(6).
- [6] 张晓校. 试论当代史学发展中的通俗史学[J]. 学习与探索,1996(4).
- [7] 蒋晓丽. 传媒文化与媒介影响研究(下)[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32.
- [8] 周兰. 纪录片——影像对历史的传播[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35.
- [9] 陈晓卿. 历史自有风情[J]. 现代传播,2001(1).
- [10] 张广智. 影视史学与书写史学之异同[J]. 学习与探索,2002(1).
- [11] 吴晗. 论历史知识的普及[A]. 苏双碧. 吴晗自传书信文集[C]. 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167.
- [13] 杨向奎. 通俗历史读物的新成果——评《中国古代史常识》[N]. 人民日报,1982-04-23.
- [14] 26[40] 中国史学会秘书处. 中国史学会五十年[M]. 郑州:海燕出版社,2004.565.
- [15] 邹广文.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论[M].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177.
- [16] 解玺璋. 通俗写史的前途和局限[N]. 人民日报,2009-03-08.
- [17] 邵鸿. 传媒时代与大众史学[J]. 南昌大学学报,2012(2).
- [18] 平民史写作逆袭:丰满正史,亲近可感[N].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4-03-11.
- [19] 李剑鸣. 通俗历史,何以职业史家缺位?[N]. 中国图书商报,2006-08-22.
- [20] 何怀宏. 一个全民书写历史的时代可能即将来临[EB/OL]. 新浪文化.<http://cul.history.sina.com.cn/zl/shiye/2014-10-23/1745728.shtml>

- [21] 张越.《中国历史小丛书的》编撰与历史知识的传播 [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09-16.
- [23] 彭明. 加强中国现代史知识的普及工作——《中国现代史常识》评介 [N]. 人民日报,1983-03-21.
- [24] 苏双碧. 一部颇具特色的故事通史——向青少年推荐《中国历史故事》 [N]. 中国教育报,1985-07-13.
- [25] [39] 郑一奇. 编辑心语 [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49、50.
- [27] 尤学工. 史学可以娱乐化吗 [N]. 北京日报,2011-01-31.
- [28] 沈彬. 草根史学的功与过 [N]. 东方早报,2009-09-10.
- [29] 王记录. 近十年来“通俗历史热”现象探析 [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2(1).
- [30] 解玺璋. 大众史学已经娱乐化了 [N]. 重庆日报,2007-12-25.
- [31] 孟隋. 被香艳隐私掩埋的通俗史学 [N]. 中华新闻报,2008-04-02.
- [32] 王记录. 当代中国史学的形态、演化及发展趋向 [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2).
- [33] 朱孝远. 西方现代史学流派的特征与方法 [J]. 历史研究,1987(2).
- [34] 王渊明. 美国公共史学 [J]. 史学理论,1989(3).
- [35] 陈新. 公众史学的理论基础与学科框架 [J]. 学术月刊,2012(3).
- [36] 李娜. 美国模式公众史学在中国是否可行——中国公众史学的学科建构 [J]. 江海学刊,2014(2).
- [37] 姜萌. 通俗史学、大众史学和公共史学 [J]. 史学理论研究,2010(4).
- [38] 钱茂伟. 公众史学的定义及学科框架 [J]. 浙江学刊,2014(1).
- [41] 李传印. 关于“易中天现象”的若干思考 [A]. 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研究 [C].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496.
- [42] 张文红,等. 2007 年度畅销书分析报告 [N]. 中国图书商报,2008-01-01.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WANG Jilu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7,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could be outlined as follow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there i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sole printing media to multimedia like film and televi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riters, there appears the change from professional historian writing to mass wri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rpose, there is the shift from education to entertai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here is the development trend from discipline dependency to discipline independ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ks appraisal, there is the development trend from academia to the public.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public history; media

【责任编辑 孙 琰】